

泱泱盛唐 千年回响

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展

甘婷婷



人饮茶十分讲究，将茶饼碾碎成末后煎煮饮用。从窖藏、墓葬以及寺院遗址中出土的茶具，为唐代的饮茶习俗提供了实证资料，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御用茶具和丁卯桥窖藏出土的镌刻荷叶形胎合银盖是其中的精美代表。

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唐代女子妆容更是翘楚，“花钿妆”“酒晕妆”“蛾翅眉”等别具一格，容光焕发。唐代女子发型有140多种，最流行梳高髻，再以华丽的头饰点缀，宛如精巧的艺术品。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女性享有更多自由，除绮罗裙带外，她们也可穿着男装，参加狩猎和马球等户外活动。这些从壁画、三彩男装女立俑等女性形象上可窥一斑。对此，不少观众在展览留言簿里提到，“唐代女性拥有的自由度令人惊奇”。爱美的唐代女性在选择梳妝用品时 also 极具巧思，镜子、珠宝盒、化妆盒以及用于日常生活的剪刀和尺子等精致物件，也反映出唐朝物质文化的发达。

文韬武略，笔墨酣畅

唐朝的开放包容，也体现在对儒家思想和宗教的态度上。唐朝奉行儒释道并行，儒家思想是治国典范，道教受到皇室推崇，佛教则深入人心。长安有大约130处宗教机构，除佛教寺庙和道观外，也有较少信众的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各个宗教教义虽不相同，但社会的开放让各文明交流交融，和谐共存。

唐朝文人名家辈出、文学书法成就斐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的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诗作，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成为千古绝唱。儒家经典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唐代不仅有中央官学，也有稳定持续的地方官学，地方官学的范围甚至延伸至乡里。第五单元展柜中摆放着吐鲁番博物馆的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该《论语》选段是12岁新疆少年的课后作业。吐鲁番距离长安有两千多公里，可见唐代教育的普及之广。

“唐僧取经”家喻户晓，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取经归来后，主持翻译了74部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由玄奘口述、其弟子编撰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中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第四单元展出的金棺银钵铜匣舍利石函、石佛坐像等彰显了唐代佛教的流行，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不仅体现出佛教哲学的精髓，也记录了丝路贸易的繁荣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玄宗时期尊崇道教，广兴道观庙宇，并设立玄宗博士，在科举考试中设立“道举”，推动道教理论迅速发展。道教思想与实践的兴盛和发展对唐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医药养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驼铃声声，丝路交融

在唐朝，丝绸之路得到全面开拓，成为连接中国



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纽带。悠悠古道上，商旅驼队将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茶叶等运往中亚、西亚，又从那里带回香料、珠宝、药材、金银器等，成就了双向奔赴的盛世繁华。此外，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由丝绸之路传入中亚、阿拉伯等地区。作为当时的“世界大都市”，长安西市外商聚集，经营品类琳琅满目，汇聚了不少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地的商品。第七单元中展出的“开元通宝”铜钱、波斯萨珊银币等体现出唐代货币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成熟。这样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唐朝经济的蓬勃发展，还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融会贯通，友好往来。

频繁的物质交流进一步助推了唐朝手工艺发展水平。宫廷作坊制作的精美器具、异域的奇物异产、地方官民进奉的各类贡品，大量涌入长安，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手工作坊(包括宫廷作坊)掌握着高超的工艺水平，展览中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丁卯桥窖藏出土的珍宝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唐代不论是手工艺作品，还是艺术审美风格，都蕴含着多元包容、大气辉煌的时代特色。

继陆路贸易之后，海上贸易从八世纪中叶开始兴起，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第八单元展出的长沙窑青釉鹧鸪斑贴椰纹纹瓷壶、邢窑白釉瓷注壶等各类陶瓷文物显示出唐代在国际海上贸易中的影响力。

三个多月的展期，将“盛唐气象”生动再现，在法国反响热烈。根据初步统计，截至3月3日展览闭幕，参观人数累计超过8.5万人次，开展一个月内日均观展人次近千人，闭幕前两日观众仍排队“打卡”。为配合展览，还举行了一系列具有唐代元素的文艺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及儿童工坊等活动，进一步加深法国和欧洲观众对“盛唐”的印象。

据介绍，此次唐代文物展是吉美博物馆在庆祝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框架下举办的第四场中国相关展览，“唐代文物展是中方赠予的一份大礼”，吉美博物馆馆长林茨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法双方也曾合作在吉美博物馆举办了“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这为此次中法团队联合办展打下牢固基础。近年来，吉美博物馆还与中国文博单位、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在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展览展示和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友好合作，共同推进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自然会吸引更多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接踵而至。”林茨说，接下来吉美博物馆将继续筹划未来几年中法合作的其他活动。

此次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办，陕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甘肃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联合主办，辽宁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协办。

融合的末期，其造像艺术融汇了多种文化的审美。展览中造像可分为单体圆雕佛像、菩萨像，有半圆思惟像、背屏式造像、卢舍那佛等。这些造像整体造型圆润柔美，面部庄重优雅，服饰贴体轻盈，“曹衣出水”的风格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佛像、菩萨等常有华丽的头饰，面部温柔恬淡的笑意展现造像艺术的魅力。在临隋佛造像中，纪年铭刻量大，材质类型多样，雕刻手法灵活，题材内容丰富被称为风格奇崛，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历史地位成为“青州样式”形成的重要起点。从明道寺创建到地宫造像的出土，临隋见证了佛造像艺术在中国扎根、吸收、创新的全过程，其造像风格不仅影响了青州地区，还为佛造像艺术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展览第三条线是佛教知识线。在佛教的知识体系中佛和菩萨造像都有一定的定义，即比较规范的标准像。佛经说佛的形象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三十二相是指佛有32种显著特征。八十种好是指32种显著的外形特征以外，还有80种不同于普通人的隐秘细微的长相特征。展览通过图文形式对佛、菩萨的发式、装束、姿态、所持手印的相关知识，做了科普性解读。

展览的三条线索，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让观众在欣赏佛造像艺术之美的同时，可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实现知识与审美、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一场特别的晋国史叙述

——苏州博物馆“吴国的北方朋友”展览侧记

刘彬彬

2025年3月，苏州博物馆推出大邦之梦系列第三展“吴国的北方朋友”。上一次的大邦之梦特展已是六年前，此次苏博重拾该系列，不再局限于长江流域吴、越、楚的纠缠，尽管三家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共性甚多，但从文献角度出发，彼此的争端要远多于交往，成就吴国大邦之梦的助力还需去长江、淮河乃至黄河以北的地区去找寻。为此策展团队寻得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蚌埠市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及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支持，展览以116件(组)文物来介绍吴国北方的筑梦伙伴——晋国，以及吴、晋之间的交往、交通与交流。

特别的叙述主题

晋国考古成果丰富、年代序列完善、出土文物精美，且考古所得与古代典籍及出土文献多可对照阐释，受到各家博物馆青睐。2022年以来，多地与山西博物院合作举办以“晋国”为主题的特展，地域上贯穿南北，横跨东西，显示了晋国历史与考古的广泛受众。苏州博物馆本馆临展厅面积较小，可展示的文物数量通常在100件左右，这意味着在挑选展品时需做出针对性的取舍，结合展览主题，策展团队将拟借文物的特征归为三点：

一是借展文物的年代需要集中于春秋时期，地域应多来自长江以北。展览标题为“吴国的北方朋友”，文献中吴国的外交活动自太伯仲雍奔吴之后缺失，后再出现已是公元前584年巫臣访吴，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大致对应春秋中晚期。因此可为吴国与中原列国交往作见证或作铺垫，并体现春秋时代背景的文物是此次展览的首选。

二是借展文物需基本说明晋国的兴衰。作为一家地级市馆，苏博素来重视展览的“在地”表达。这种表达不仅要考虑展览与地方原生文化的融合，还要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苏州在此之前尚未组织过与两周晋国直接相关的专题展览，因此如何向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本地社群清晰介绍晋国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是完善此次展览的关键。

三是借展文物需体现两周时期的亲缘关系与外交特征。题眼中的“朋友”关键而又恰当，关键在于从当今的言辞去阐释，展品应说明晋吴为何开启、如何维持彼此的友睦关系，两邦相隔千里，又是怎样互通有无，这与春秋时期列国交往与交通直接相关；恰当在于“朋友”在两周金文语境中，有宗族兄弟之意，这与文献中吴为太王之昭，晋为武王之穆的宗法世系相合，怎样体现宗法礼制，并说明其使用与崩溃也成为挑选展品时的一项标准。

据上，策展团队从五家单位共借展99件(组)文物，其中64件来自山西博物院，大约50件是外展的常客，但相较以往着重于西周晋侯墓地，此次春秋时期的文物占比更高，新增展品亦以山西出土的吴国相关文物为主；12件来自江苏省考古研究院，为最新的考古成果，如北白鹤墓地、陶寺北墓地、邱家庄墓地，帮助完善三晋地区出土文物的体系；河南博物院8件展品，出自新郑李家楼墓、琉璃阁甲墓和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性质上与从蚌埠市博物馆所借7件双墩一号墓铜离宫展品相似，是晋吴之间地域域内的出土文物，从侧面补充时代背景、提供交通线路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的8件展品，虽是以楚式风格的器物为主，但丰富了展览架构，也引出了展览最关键的线索人物——申公巫臣。

特别的叙述思路

微观史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日渐成熟，其关注“具体的、易于观察的、个别”的事物，其中以普通人的故事最为动人。申公巫臣为楚国公族，申地长官，领晋国外交，位至邢地大夫，故去后树碑立传。如果展览先让观众知道巫臣其人，再由他的政治历程去了解晋国崛起、晋楚争霸、晋吴相交、公室单薄、黄池争先等历史背景，那么也能是展览叙述的一个视角。由此，展览结合巫臣的个体行为和晋吴的交往历史，分出奔、委质、聘问与会盟四个单元。

“出奔”指的是申公巫臣应楚共王命出使齐国，但至郑国时携夏姬奔晋。该单元分“实县息申”与“楚材晋用”两组展品。前者主要借河南彭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铭文器解释巫臣官名“申公”的由来，同时也对当时楚国灭国设县、北上争霸的野心做交代；后者从巫臣出奔晋国而非其他诸侯国的选择入手，以河南李家楼郑公墓楚式与中原式器物共出的现象，暗示中原列国“朝晋暮楚”之举，又以蔡国器物引



志愿者在展厅内讲解(图/苏州博物馆志愿社)

发蔡声子关于“楚材晋用”的论述。

“委质”意为巫臣来到晋国之后，向晋景公献质为臣，表效忠心。这一单元展厅叙述主体由巫臣转为晋公，借景公之口追述先君功绩。策展团队有意在该单元的展览结构上仿效金文述功体裁，对晋国历史的回顾没有完整地从叔虞封唐讲至三家分晋，而是选取了三个帮助晋国构建霸主身份的重要节点。一是“维周之翰”，晋国作为姬周一支，无论是晋侯墓地鼎簋制度表现出的恪守礼法，还是两周之际护卫平王东迁，都对王室稳定做出的贡献；二是“曲沃代翼”，以山西羊舌墓地为代表的翼城大宗和以山西上郭墓地为代表的曲沃小宗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争斗，最终景公先祖小宗一支成为大宗；三是“献文制霸”，以山西近年揭露的与晋文化面貌不尽相同的周边城邦反映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疆域扩张，而文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是晋国在公众眼中的标志，此处展示了一件晋公盂以引述其功业。

“聘问”即指巫臣奉晋景公命，出使吴国。这一部分对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一是巫臣沿着怎样的路线由晋国来到吴国？二是巫臣通吴，为吴国带来了哪些变化？针对问题一，分别以提梁盃和紫水晶珠两类器物在吴与晋的出现，指出江淮和海岱地区在南北交通中的枢纽作用；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从文献资料解读入手，包括巫臣为吴国带来车马御射之法及其留子屈狐庸在吴任行人之官，在战争与技术、礼法与习俗两方面对吴国的影响等。

“会盟”单元亦作两部分，前以赵氏内部之会盟，即侯马盟书引出晋国公室衰微的局面。展览分别以公贾卿讨论异姓家臣制来源，以河南琉璃阁阚氏墓地回望“尽逐群公子”“诸卿之乱”，以山西太原赵卿墓、潞城潞河墓地和长治分水岭墓地指示三家分晋。其后以金胜村崤山土、与大英博物馆藏赵孟介壶造型极肖的莲瓣盖双耳壶为串联，接续晋吴黄池之会。该单元还引用了山西金胜村出土吴王夫差鉴与万荣庙前出土王子于戈，前可见吴国王室器物在晋国公卿家族之流行，后可知吴器在晋地南北分布之广域。

特别的叙述者

当下大众对文物与博物馆的了解与热情与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观众对文物背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以及随之产生的共鸣超过文物本身。除了“明星”文物或者时下热门的考古IP，其他文物要激发观众的好奇与兴趣，则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普及文物内涵和历史信息。此次展览配套的志愿者讲解比较好地做到了这点。

考虑到多数志愿者可能与观众一样并不是对所有文物和专业名词都十分熟悉，所以按照苏博惯例，在开展之前对志愿者进行专门的讲解培训和展览导览。从开展后情况看，志愿者讲解获得了良好成效。在有限的展厅空间内，不少志愿者的专场讲解时长可达两个小时，做到帮助观众理解展览。志愿者并不只是围绕展品本身讲解，而是更多强调展览的结构设置以及每个单元甚至每组文物的历史背景与组织逻辑。志愿者还结合自身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将展览可讲述的内容铺陈得更深或更广，即由纯粹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了结合展览发挥各自长处“智力资源”。此次展览，志愿者不仅仅是讲解员的替补者或是策展人的转述者，而是结合展览内容进行二次传播的创作者，类似线下喜闻乐见的“二创”。此外，在遵循策展思路的基本前提下，志愿者在讲解中也获得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这对于志愿者在博物馆的身份而言，或许较有意义。



固始侯古堆、长治分水岭、蚌埠双墩出土提梁盃(图/苏州博物馆宣传推广部)

从青州微笑到和美临胸

——临朐县博物馆“观自在”佛造像艺术专题展巡礼

衣同娟

当青州微笑被更多观众记住，却鲜有人知道来自临朐的和美。临朐作为古青州腹地，汇聚了从陆路、海上在此交汇的关于佛教文化造像背后的故事。

5月18日，在2025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山东临朐县博物馆推出“观自在——临朐佛造像艺术专题展”，步入序厅，迎面静静矗立着一尊青灰石佛造像，它没有“青州微笑”造像彩色袈裟的华丽，也没有来自皇家寺院的心满意足的微笑，而是褒衣博带、双眼微眯，一身和美。展品背后设计“守望千年的眼睛”，眼眸中隐约可见庙宇初建的巍峨，灭佛时的苍凉，瘞藏时的舍衣建塔和渐行渐远的背影。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内容由三条展线构成，一条历史文物线，一条造像艺术线，一条佛教知识线。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有侧重地观看。

展览第一条历史文物线，也可以说是跨越千年充满传奇的关于文化传承的故事线。故事从1984年春沂山风景区上寺院村村民建房时发现地宫说起，同年10月临朐县文化馆对地宫进行了清理，共清理出大小佛像碎块600余块，其中“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是最重要的物证。壁记形成于北宋景德元

年(1004年)，记录了当年二位僧人觉融和守宗游历至明道寺时“到处散落着被毁佛造像”的情景，他们决定舍衣建塔，将这些破损的造像保护起来，并由镇海军节度行军司马郑归昌撰文，记录此事件的来龙去脉。舍利塔建成典礼的当天，记有32人参加，其中不乏官员、僧侣、施主，这说明当时舍利塔修建是全民参与的功德行为。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明道寺始建于东晋咸安元年。据《东镇述遗记礼》载：“明道寺大竟数十亩，面临汶水，背靠凤凰岭，左毗官道，右依镇山，寺钟山音回荡，香火升腾云烟。每逢朔望，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从其藏墓中可见，明道寺从最早记年北魏正光元年(520年)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历经77年。经推断，宋代的觉融和守宗看到的毁佛现场，应该是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导致的。从东晋咸安元年(371年)明道寺到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的舍利塔地宫，再到现在的临朐县博物馆造像艺术专题展厅，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及其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

展览的第二条造像艺术观赏线，展出的造像绝大部分属于北齐时期。北齐处于中国第一次民族大

